

「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学术丛刊13」



魏家川 著

先秦两汉的

诗学嬗变

从「《诗》云」「子曰」到「子曰诗云」



教育部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规划项目



學苑出版社

先秦两汉的诗学嬗变

——从“《诗》云”“子曰”到“子曰诗云”

魏家川 著

學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先秦两汉的诗学嬗变:从“《诗》云”“子曰”到“子曰诗云”/魏家川著. -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8

ISBN 978 - 7 - 5077 - 2914 - 6

I. 先… II. 魏… III. ①古典诗歌 - 文学研究 - 中国 - 先秦时代
②古典诗歌 - 文学研究 - 中国 - 两汉时代(前 202 ~ 220)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16218 号

出版发行:学苑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 2 号院 1 号楼 100079

网 址:www. book001. com

电子信箱: xueyuan@ public. bta. net. cn

邮购电话: 010 - 67674055

销售电话: 010 - 67675512、67602949、67678944

印 刷 厂:高碑店市鑫宏源印刷厂

印 张: 10.25 印张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6.00 元

目 录

导 论	(1)
一、从“子曰诗云”说开去	(1)
二、《诗》:从集部到经部的文化权力升级	(11)
三、子学之《诗》与经学之《诗》	(17)
四、从《诗》经看经典的建构、解构与重构	(31)
第一章 以《诗》设教:孔子与诗学儒学化的肇始	(37)
第一节 “《诗》教”作为一个历史范畴	(37)
一、原生的“《诗》教”	(38)
二、衍生的“诗教”	(67)
第二节 儒学与诗学的结胎与分娩	(76)
一、孔门道统与学统的相辅相成	(77)
二、儒学“博学于文”与《诗》教“以文化成”	(87)
第二章 解《诗》尚法:孟子与诗学儒学化的集成	(94)
第一节 “述仲尼之意”的“亚圣”	(94)
第二节 “诗言志”的理论拓展:“以意逆志”“知人论世”	(110)
第三章 引《诗》证言:荀子与诗学经学化的先河	(135)

第一节 集子学大成的稷下大师	(135)
第二节 原道、征圣、宗经与用《诗》为喻	(154)
第四章 从体道之儒到传经之儒	(177)
第一节 体道之儒与传经之儒	(177)
第二节 从体道到传经的三维路向	(210)
一、私学与官学	(210)
二、述而不作与注不破经	(213)
三、亦师亦友与师法家法	(221)
第五章 从子学之《诗》到经学之《诗》	(228)
第一节 春秋赋《诗》:子学之《诗》的历史前奏	(229)
第二节 先秦子学之《诗》的文化功能与文化阐释	(259)
一、子学之《诗》与巫卜文化	(260)
二、子学之《诗》与史官文化	(270)
三、子学之《诗》与士人文化	(279)
四、子学之《诗》与礼乐文化	(284)
第三节 两汉经学之《诗》的文化功能与文化阐释	(291)
一、经学之《诗》与鲁齐韩毛	(291)
二、经学之《诗》与美刺之说	(303)
三、经学之《诗》与比兴之思	(313)
主要参考文献	(318)
后 记	(322)

导 论

一、从“子曰诗云”说开去

《诗》在先秦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究竟拥有过怎样的地位、发挥过怎样的功能？为什么儒家对《诗》情有独钟？为什么恰恰又是对《诗》情有独钟的儒家在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两汉经生的诗学，借“诗”还的又是什么样的“魂”？作为文化元典，《诗》曾以多种形态存在：合乐之《诗》，容舞之《诗》，子学之《诗》，经学之《诗》，理学之《诗》，小学之《诗》，博物之《诗》，文献之《诗》，文本之《诗》，文学意义上的文体之《诗》……尽管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传统的《诗》经研究在“依经主义”的儒家诗教衣钵中鹅行鸭步地挪移着，但蓦然回首，《诗》经研究的历史路向，还是清晰地呈现为《诗》经学从古典时期文化意义的最大化向现代时期文学意义的最纯化以及当下再度向文化研究回潮的嬗变^①。两千年来，《诗》经的文化元典精义被一次次演绎，《诗》经的诗学教化功用被一次次开发，《诗》经的文化价值被一次次抬升，《诗》经的审美意义被一次次提纯。说不尽的

^①近年来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与审美主义象牙塔的倒塌，《诗》经研究的文化阐释东山再起。

《诗》经,每每引逗学人对那个已逝的“子曰诗云”时代的一次次遥想。

这种遥想甚至发生在遥远的西方。美国意象派大师庞德,将他的《诗》经选译本称之为《孔子颂歌》。^① 这似乎多少有些让我们感到莫名其妙。莫非真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此中消息,恰好在英国著名东方学家威廉·琼斯早年轶事中得以透露。当威廉·琼斯第一次读到来华的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翻译的《中国哲学家孔子》时,译本中不但有“子曰”,还有“《诗》云”,他马上被孔子议论里点缀着的诗歌片断所感动。如痴如醉的威廉·琼斯,产生了将《诗》经翻译介绍给广大英国读者的强烈冲动。^② 可见,即便在遥远的异国他乡,“子曰”与“《诗》云”,孔学与诗学,在西方的东方想象中,似乎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史实恰是如此。有学者统计,在先秦汉魏文献中,所载孔子言诗者达 190 余次之多。^③

“子曰”与“《诗》云”连缀而用,早已成为尽人皆知的汉语成语:“子曰诗云”。这四个字对于初通文墨的国人来说,一望而知,似没有什么深层信息与玄奥之义,也没有必要煞有介事地条分缕析。但笔者以为并不尽然。事实上,它标志着先秦诗文化从西周时期礼乐文化向春秋战国时期士人文化、儒学文化的重要转型,体现了“礼崩

①参见胡先媛著《先民的歌唱——〈诗经〉》,265 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

②同上,252 页。

③参见《第二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333 页,语文出版社,1996。

乐坏”、“王纲解纽”、“道术为天下裂”的时代症候,同时也是华夏诗性、诗化文化与生活方式的古老标本,中国传统学问的重要质素,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经学与诗学历史性融会的具体表征,“原道”、“征圣”、“宗经”精神的生动体现,也是儒家学说与儒家诗学言说格局、言说路向、言说方式与意义生成方式的重要范式。试问,六经之中,何以只有“子曰《诗》云”积淀为成语,而没有生成“子曰《书》云”、“子曰《礼》云”、“子曰《易》云”……之类的成语?

物从细处断,严格来讲,“子曰诗云”应该书写为:“子曰”“《诗》云”,其次序应是“《诗》云”“子曰”。中国作为诗歌的超级大国,历代诗人多如过江之鲫,历代诗作更是汗牛充栋,这里的“《诗》”,也不是泛指一般的“诗”,而是特指中国历史上首部、同时也是最具奠基性的诗歌总集《诗》经,所谓“《诗》云”,就是《诗》经里说,也就是有《诗》为证,引《诗》证言,以《诗》作喻,以《诗》言志,以《诗》明道;^①先秦诸子蜂起,百家之众,但“子曰”的“子”并非泛指“诸子”,而是特指中国历史上首屈一指的圣人孔子,所谓“子曰”就是孔子之说,孔子的不刊之论,孔学精华。“子曰”、“《诗》云”并举,表明儒家学说、儒家诗学的许多重要范畴都与《诗》经密切相关,《诗》是儒学特别是儒家诗学生成的重要内核,同时也意味着儒家学说与中国传统诗学之间的亲密关系以及两者之间的重大互动影响。

^①先秦引《诗》也称“《诗》曰”,为了避免与后来(较为固定)的“子曰”在用词上重复,成语定格为“子曰诗云”。

“子曰《诗》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和染色体。“子曰《诗》云”这个如此颇具深文大义成语，由于约定俗成被简化为“子曰诗云”，在意义上也发生了变化。在词法上，它一目了然，“子曰”、“诗云”均为主谓词组，二者组合构成联合词组。作为成语，它言简意赅，内含丰富，但后经引申主要用以泛指儒家典籍或形容儒生引经据典迂腐不通时务等。它较早的出处，见于元代宫大成《范张鸡黍》第一折：

我堪恨那伙老乔民，用这等小猢猻，但学得些妆点皮肤，子曰诗云。

曾几何时，谁料想，那么厚重的国学精华与那么美妙的文学精品，在“那伙老乔民”与“这等小猢猻”那里，竟蜕变成了“妆点皮肤”。“国粹”从而沦为“国糟”。

《论语》开创以“子曰”起言之先例。《论语》记载孔子的话，基本采取以“子曰”为中心的这样两种形式：单纯的“子曰”和针对于某人提问的“子曰”。这两种形式在性质上是有很区别的，前者相当于独白，后者才类似于问与答；前者的具体语境基本被省略掉了，而后者则部分地保存了当时的语境。从全篇来看，前者出现的频率远高于后者，《论语》的问答形式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对话”，所以《论语》基本上是“子曰”式权威独白性质的。一些学者指出，孔子时代原来那种一体化的官方意识形态，尽管已经是支离破碎，私学已经兴起，但是比较系统并且有较大影响、能够与儒学分庭抗礼的学说却还

没有产生。在这样的文化空间之中所弥散的还是宗周礼乐文化的碎片。孔子作为第一个试图将这些碎片重新组合为一个整体的士人思想家,其言说方式就必然充分显示一个“立法者”的特点:单向度的、传教式的或自言自语式的。

不仅如此,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言必称某某,大多内含某种心理值较高的情结、意结。《论语》频频出现的“子曰”,也同时体现了儒学门生对先师“执弟子礼甚恭”的敬重和儒家一以贯之的“畏圣人之言”的敬畏。文化人类学告诉我们,在原始交感巫术思维的作用下,幼稚的童年以及人类的早年往往热衷于对权威之言的直接引用以获得心理与精神助力。不托之“子曰”则显得其道不尊、其说不灵。以现代文化阐释学和文化政治学的观点来看,某个文化领域,谁在说、说什么、怎样说、为何说以及往往更富有趣味的沉默的背后,凡此种种,都有蛰伏于“语言无意识”之中的“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都有深究的必要和深藏的意义,其中每每隐匿着“政治无意识”的权力关系与利益分配。孔门后学以“子曰”起言,无疑是对先师“述而不作”遗训的发扬光大,在文化传承、文化缔造、文化权力与文化利益等方面占了先机、抢了先手,为汉武帝、董仲舒“为汉定道”、醉翁之意不在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奠定基础,打下伏笔,从而使先秦盛极而衰的儒学又一次时来运转,东山再起,于是孔子便于“鲁殿灵光”中摇身一变而为万代之师、无冕素王,获得无与伦比的独尊地位。钱穆先生指出:“中国学术具最大权威者凡二:一曰孔子,一曰《六经》。孔子者,中国学术史上人格最高之标准,而《六经》

则中国学术史上著述最高之标准也。自孔子以来二千四百年,学者言孔子必及《六经》,治《六经》者亦必及孔子。则《六经》之内容,及孔子与《六经》之关系,终不可不一先论也。”^①

《诗》经,堪称六经之首。故而“《诗》云”的分量自不待言。在中国,哪里有传统文化,哪里就有“《诗》云”,反之亦然,哪里有“《诗》云”,哪里就有传统文化。除了《左传》、《礼记》之外,“《诗》云”在《论语》、《孟子》、特别是《荀子》等著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和典型。以“《诗》云”起言或结言的格式,显然是一种文化策略。先秦儒学三圣不约而同地以“《诗》云”起言,《诗》才有可能被后儒抬升为“经”,才会形成后世“依经立义”与“征圣”“宗经”的历史文化局面。先秦儒学三雄早为门下弟子树立了征圣、宗经的楷模。从某种意义上说,“《诗》云”在言说范式上是对“子曰”的一次启示,“子曰”则是对“《诗》云”言说方式的演绎与发扬光大。作为重要的知识范型与言说范式,“子曰”与“《诗》云”一脉相承,故而最终黏合到一起。孔子以《诗》设教,开先秦诗学儒学化之先河;孟子解《诗》尚法,推进了诗学儒学化之进程;荀子引《诗》证言,为先秦高度儒学化的诗学自两汉走向彻底的经学化打下伏笔。

两汉以来,“子曰”、“《诗》云”更成后人之依托。扬雄《法言·吾子》曰:“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好说而不要诸仲尼,说铃也。”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于是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子

^①钱穆著《国学概论》,2-3页,商务印书馆,1997。

曰”、“《诗》云”不绝于口,不绝于耳,成为无法动摇、逆转、颠覆和取代的权威言说。旧式文人每每挟“子曰”、“《诗》云”以盛气凌人,在“子曰”、“《诗》云”中一逞才学,一见高低,在“子曰”、“《诗》云”中摇头晃脑,高谈阔论,沉醉于自己的满腹经纶,深博无涯。在经学的封建意识形态的禁锢下,只有像李贽那样屈指可数的狂狷之士敢于不以孔子是非为是非,并在《焚书》、《续焚书》以及《四书评》等著作中对“子曰”、“《诗》云”老大不敬;只有像经历明代资本主义萌芽、崇尚俗世欲望与情怀的思想解放洗礼的冯梦龙才敢把儒家六经视为言“情”的教材,明确提出“情教”,与经学的“名教”分庭抗礼。在《情史序》中,冯梦龙独树一帜,指出:“六经皆以情教也。《易》尊夫妇,《诗》有《关雎》,《书》序嫫嫫之文,《礼》谨聘、奔之别,《春秋》于姬、姜之际详然言之。岂非以情始于男女,凡民之所必开者,圣人亦因而导之,俾勿作于凉,于是流注于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间而汪然有余乎!异端之学,欲人鰥旷以求清静,其究不至无君父不止。情之功效亦可知矣。”在所撰的《情偈》中,他更是把“情”推到了极处,赋予“情”以哲学本体的地位和宗教信仰的意味:“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无情,不能环相生。生生而不灭,由情不灭故。四大皆幻设,惟情不虚假。有情疏者亲,无情亲者疏。无情与有情,相去不可量。我欲立情教,教诸众生。”这与汤显祖“问世间情为何物,只教人生死相许”、“终日搜索断肠句,世间唯有情难诉”的心声异曲同工,如出一辙。正是晚明的这种唯“情”主义和思想解放,使《诗》经从坏死中复苏,开始大面积地摆脱经学的阴影,走向性灵的文学,从

先秦诗学的开山纲领“诗言志”，走向魏晋以来的诗学新美学“诗缘情”。《牡丹亭》中的一个有趣的片段，小中见大，生动体现了这一独特的历史情境：杜太守因为《诗》经“开首便是后妃之德，四个字儿顺口”，希望女儿杜丽娘能从“诗教”中培养出贤淑之德来，于是为其延师教授《诗》经。私塾先生陈最良照章办事，一上来教的便是“关雎鸠”，并引发了一大通经生腐儒的陈词滥调：“论六经，诗经最葩，闺门内许多风雅。有指证，姜嫄产哇。不嫉妒，后妃贤达。更有那咏鸡鸣，伤燕羽，泣江皋，思汉广，洗净铅华。有风有化，宜室宜家”，“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没多些，只‘无邪’两字”。然而杜丽娘这位闺门女子，却并没有从中感受到“后妃之德”的神圣伟大，反而在读完《毛诗》第一章“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后，“为诗章，讲动情肠”，生发了“关了的雎鸠，尚然有洲渚之兴。何以人而不如鸟乎”的感想，悄然废书而叹曰：“圣人之情，尽见于此矣。今古同怀，岂不然乎？”于是情窦初开，相思生发，一发而不可收拾。当陈最良询问杜丽娘“病症因何”，侍女春香没好气地说：“师父问什么！只因你讲《毛诗》，这病便是‘君子好逑’上来的。”接下来的对话颇有后现代的“戏说”、“大话”色彩，以极为“搞笑”的方式彻底“解构”了汉儒对诗经的惨淡经营：

陈最良：“是那一位君子？”

春香：“知是他那一位君子。”

陈最良：“这般说‘毛诗’病用‘毛诗’去医。那头一卷就有

女科圣惠方在里。”

春香：“师父，可记得《毛诗》上方儿？”

陈最良：“便依他处方。小姐害了‘君子’的病，用的史君子。《毛诗》：‘既见君子，云胡不瘳？’这病有了君子抽一抽，就抽好了。”

春香：“还有甚药？”

陈最良：“酸梅十个。《诗》云：‘标有梅，其实七兮。’又说：‘其实三兮。’三个打七个，是十个。此方单医男女过时思酸之病。”

春香：“还有呢？”

陈最良：“天南星三个。”

春香：“可少？”

陈最良：“再添些。《诗》云：‘三星在天。’专医男女及时之病。”

春香：“还有呢？”

陈最良：“俺看小姐一肚子火，你可抹净个大马桶，待我用梔子仁、当归，泻下他火来。这也是依方：‘之子于归，言秣其马。’”

春香：“师父，这马不同那‘其马’。”

陈最良：“一样骍秋窟洞下。”

杜丽娘：“好个伤风切药陈先生。”

春香：“做的按月通经陈妈妈。”^①

袁枚在《小仓山房文集》卷三十《答戴园论诗书》中亦云：“且夫诗者由情而生者也，……情所最先，莫如男女。……缘情之作，纵有非是，亦不过《三百篇》中‘有女同车，伊其相谑’之类，……圣人复生，必不取已安之心而掉磬之也。”

自“砸烂孔家店”的新文化运动以来，满口“子曰”、“《诗》云”，已成为封建旧式文人的基本特征和传神写照。鲁迅在《一件小事》、《孔乙己》、《在酒楼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等小说、散文和杂文中均对“子曰诗云”竭尽冷嘲热讽之能事，“子曰诗云”开始成为新文化运动的运动对象，一个百分之百的贬义词。“孔家店被人打倒，老板没有错，都是店员们搞错了的”^②。依笔者看来，最根本的错处在于这个店开得太大太久。店大欺客，向来如此；宅老闹鬼，历来如斯。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随着国学热、民族复兴以及文化产业等的兴起，孔家店似又有了恢复生意、连锁经营的迹象。如有人以“子曰诗云”为笔名，在无一点“子曰诗云”气息与精神的现代网络媒体上混了个脸熟；如广州一小学要求学生每天背诵“子曰诗云”10分钟，全国各地教育系统的读经运动蓬勃兴起……

^①参见汤显祖著《牡丹亭》第十八出“诊祟”。

^②南怀瑾著《论语别裁》，35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二、《诗》：从集部到经部的文化权力升级

作为学术问题,“子曰诗云”绝非仅仅是一单纯的成语。我们若对“子曰”、“《诗》云”作较为深入的探究和较为系统的知识考古,则不难发现,在先秦两汉,《诗》作为华夏第一部诗歌总集,本来也许只是表现俗世情怀、大部分甚至是以口耳相传的方式流传在民间的诗作,可是在文、史、哲浑然不分,诗、乐、舞三位一体的先秦总体文化以及周王室以来社会、政治、文化场域与历史诡计的支配与左右之下,《诗》并没有被有效地送入文学的轨道,纳入文学的范畴,而是在先秦两汉融入儒学,飙升为经,灿烂(或许偏激者视之为腐烂?)为两汉的经学。长期以来,经、史、子、集“四部”,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学问的“四大家族”,其排列的次序往往也是其文化身份、话语权力以及历史地位的体现。^① 特别是“经”,作为四部之首,至高无上,获得了不言自明的权威地位。事实上,没有天生的“经”、纯然的“经”、绝对的“经”,中国古代史官文化繁盛,故而一些人认为六“经”皆史,一开始并无“经”的范畴与“经”的存在,它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史”、“子”、“集”合时之需,应时之求,脱颖而出,遂而成“经”,于是

^①西方文化“强生分别”,使中国社会“学问”一事不再限于传统的“四部”,而是拓为现代的“百科”,且“文化秩序”、“文化权力”也发生了沧桑之变。有人认为中国古代经、史、子、集的文化话语范型阻滞了更加细密的学科划分,它与中国古人对天地自然与社会人生之间以及一切事物之间的一致性予以高度重视而对事物间的差异性则比较忽视这一思维特点有关。

乎从五“经”到六“经”到十三“经”乃至更多的“经”，随着历史文化的雪球越滚越大，像《尔雅》、《说文解字》这样的工具书，也有机会成为“经”。“经”而“神”，“神”而“经”，最终演化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神经”，传导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一般而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大多聚焦于“集”部，尽管“集”部也并非全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先秦的大文学观念、杂文学观念，两汉的依史论经，依经论文，使得先秦两汉的文学研究“经”、“史”、“子”、“集”互渗，“互文性”过度，从而形成其独具特色的儒学化、经学化路向，影响而又区别于后世的文学研究。后世言文学者无不推原于大道，根柢于六经。清人朱彝尊《答胡司臬书》云：“秦汉唐宋，虽代有升降，要文之流委而非其源也。颜之推曰：‘夫文章者，原出五经。’而柳子厚论文亦曰：‘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情，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王禹偁曰：‘为文而舍六经，又何法焉？’李涂曰：‘经虽非为文而设，而千万代文章从是出。’是则六经者，文之源也，足以尽天下之情之辞之政之心，不入于虚伪而归于有用。执事诚欲以古文名家，则取法者莫若经焉尔矣。”

作为“集”部的《诗》，作为“子”部的《论语》，在先秦首批文献典籍中，在世界古典轴心时期的文化星系形成之际，皆由璀璨的文化星云生成耀眼的文化星座。“子曰诗云”的形成正是这一过程的生动写照。众所周知，“《诗》”的资格要远老于“子”。先有“《诗》云”，后